

#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4月27日 第B4版)

### 八、无望

10月17日，昆医召开全院大会。领导在上，员工在下，气氛严肃又有些异样。李宗恩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就像章伯钧成为右派后，每次去民盟中央开会都会选个“杳杳”坐下，以避免遭遇难堪。

开会了！

会议内容有一项最为重要：宣布朱锡侯、朱肇熙、缪安成三位先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宣布完毕，院领导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瞬间，他们由敌人成为人民，从“独木桥”转入“阳关道”。摘帽的教授们夙愿得偿，自然是兴奋的。但他们的心里又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是在读到朱锡侯先生的八十自述《昨夜星辰昨夜风》（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知道的。“自述”里面说，早在10月2号上午（即国庆节第二天），就得知“摘帽”的喜讯，获悉之时，自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逢喜事，怎么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朱锡侯——留法心理学、生理学双博士，中国近代心理学创始人，在“肃胡”运动中，因交代不清与好友贾植芳的关系而两次跳楼、一次触电。1955年侥幸没有划为“胡风反动集团”成员，1957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对此后漫长的“改造”岁月，朱锡侯这样写来：“牢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右派分子能回到人民中来的，最多也不过百分之五十，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回不来的——我时时想着这段话，觉得自己如果回不到人民中来，戴着帽子离开人间，那将是最大的耻辱，是任何人都可以唾弃和鄙视的‘狗屎堆’。所以，必须彻底打掉自尊心，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必须把每一次训斥，每个人对你的监督，每一天的苦役劳动，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辱骂，都看做是关心和拯救你；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丧失了人的尊严，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么用，怎样揉，怎么踩，都无所谓的时候，才能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见“自述”第149页）读到这里，全身震颤不已，我马上理解了朱锡侯先生获悉摘帽消息时所说的“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全部含义。

心潮汹涌而面如平湖，没有摘帽李宗恩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自控力一向很强的他，力图做到无喜也无悲，无晴也

无阴，但已经难以做到了。问题是今后这个“改造”，教人何处下功夫？以前的事情不能想，以后的事情不敢想，仅凭参加几个座谈会，提出几条意见，和章伯钧夫妇的几次往来，就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就能成为一个人的罪行？没有人能够回答。此前的成就、劳苦以及快乐，此后都要用孤立、自责和寂寞来偿还。左派反感谢你，同类“右派”也嫌弃你。都说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其实没有半点人性，半点人情。

过了一个月，深深的艰窘和屡屡的打击始终无法平复，只有在隐忍中把伤痛和困惑埋到最深处。李宗恩在11月15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上月中旬，当朱锡侯、朱启照、缪安成三位先生被宣布揭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内部的时候，我很震动并在思想上出现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首先，我以为我之不能归队原因恐是我的罪名我以为比较严重，影响比较大，危害性又深远。这一思想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只认识到问题不在于罪名的轻重，而在于对于它认识。

我对朱锡侯、缪安成两位先生的归队没有意见，但朱启照先生亦能在本次此次摘去帽子有些不解。我以为我的改造并不比他差，甚至比他还强。这一思想当然更成问题。实际上对他的改造情况我却知道的很少，所见到的不过是些表面现象，怎能据此下结论？这种结论就是对党不信任。

另一个思想是如果需要我像朱锡侯先生那样写数十万言的书面检查才能揭帽子的话，我的希望就很少了。

“我的希望就很少了”——末尾一句，道尽李宗恩的沉重与沉痛。俗话说：“铺路十里，不差最后一簸箕。”李宗恩猛然间发现自己与摘帽的三位同事相比，差的可不只是“一簸箕”。从1957年“反右”到58年“划右”，每一天的思想改造唯恐不努力，工作唯恐不尽心，说话唯恐不检点。此番看到别人摘帽，他才算突然明白：原来命运压根儿就没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切的辛苦付出和所有的小心谨慎与上边对自己的掌控和处置，半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说：任你殚精竭虑，人家对你依旧。李宗恩的思维逻辑性、条理性一向被人称道。但自“划右”后的三年，他才恍然大悟，别看每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劳动，算得“习文又

习武，知子又知午”。其实除了医学，自己啥也不懂！他在日记中坦陈实在是没有能力用中文动不动写出数十万言思想检查。文字的背后是无法言表的哀伤和剧痛。一个灵魂赤裸在苍凉的大地，即使选择坚忍也无法拯救自己。

人落到这一步，什么都来不及了。

### 九、无望

修行再好，承受力也是有限的。

过了新年（1962），李宗恩身体的不适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早晨头昏、头痛，活动几下就气促，总是容易疲乏。之后，两腿发现肿胀。从2月1日开始，他彻底休息了。2月底，病情毫无改善，医院建议住院治疗。

前路坎坷，后路渺茫，问题是还有“后路”吗？李宗恩是医学家，懂得生命的周期，纵有千般不舍，也难抵“离去”的到来。他意识到终点临近的时刻，日子非但以“天”来计算，且有些事因内容的沉重而意义重大。其间，决定性的责任则落在自己的身上。李宗恩知道：任何一种处置态度与方法，对死者固然重要，但对生者则更为重要，一切都要有所交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首先是结束责任，工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继而安顿亲人，告别朋友，用最深的情感祝福未来。李宗恩性格中的理性、仁慈、学识与性情等多重因素，使得他比別人更懂得如何书写人生故事的结局。

2月28日，他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在昆明医学院图书馆服务已将两年，主要在中西期刊组工作；同时结合医学院教学和科研，需要收集些医学文献资料。

最近身体较前衰弱，血压高，疲乏，有时腿肿，上了几岁年纪，血管有些硬化，影响心脏和肾脏功能。组织上给我很多照顾，春节前后让我休息了一个月；生活方面亦很关怀。我是非常感激和感动的。昆明今年冬季较往年寒



1956年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

冷，并下过……雪，对我是一种考验。现已春回大地，觉得舒服多了。再有一两个星期总可以恢复工作了。

兹寄上最近的思想总结一份，请查收，并1962全年党费¥17.28。

“雪，对我是一种考验。现已春回大地，觉得舒服多了……”平静的文字，在我读来却是一阵心惊：他的这封信仍是寄给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要知道，就是这个党及其负责人章伯钧在1957年夏季，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对此，李宗恩难道不明白？当然明白。既然明白，为什么还要和这个党保持联系并坚持到临终？我不解。对应该诅咒的党，竟无一点怨恨？我不解。据我所知，很多名医，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不管后来是不是右派，自“反右”运动以后（有的还在运动当中）都要求退出民主党派，或书面提出，或主动疏远，或不再缴纳党费，如此情况几乎占了七八成。一位有名的西医，“文革”后期与我家同住一栋大楼。即使是邻居，他也不和我的母亲说话，哪怕是电梯里面面对面站着。看得出来，人家是从心里厌恶章罗联盟及其家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谁搞的“反右”？名医心中是明确的。但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压力，久处政治阴影下的恐惧心理，以及趋利避害等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人的选择取向——从1949年至今，靠拢共产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群体灵魂。一顿政治暴洗，把中国知识分子原本就不怎么硬朗的筋骨压扁碾碎，几乎没有个体灵魂可与之抗衡而单独存在。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